2005

经济中国

主　编：喻世友

副主编：何兴强　史　卫　黄文锋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经济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前　言

中国的2005年，是继往开来的一年。在经历了多年“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开放探索后，中国在发展理念与发展模式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十一五”规划确立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取向，以理性的思维确定和谐发展的新道路。

中国的2005年，是革故鼎新的一年。中国各项改革有序推进，既有和风细雨、波澜不惊，也有大刀阔斧、一动而牵天下。税制改革、汇率改制、地产新政以及股权分置得以顺利及时地进行，彰显智慧、勇气和魄力。

中国的2005年，是利益博弈的一年。在发展过程中，各种利益关系交错，不同利益主体相互博弈，捭阖纵横。国际贸易摩擦纷至沓来，企业商务竞争硝烟四起。竞争与合作，冲突与和谐等不同音符演奏出一曲错综复杂的交响乐。

中国的2005年，是风生水起的一年。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生活面貌日新月异。民营经济在逢遇良机中迅猛崛起，农业发展在艰苦探索间又有了新的考量。社会打破垄断呼声高涨，能源告急事件跌宕起伏。如此等等，在那看似惊心动魄却又寻常平淡的岁月中风起云涌，汇聚成一种力量震动耳鼓，催人奋进。当我们站在2006年的门槛上回望时，中国2005年的经济景象，犹如一幅波澜壮阔、色彩斑斓、精彩缤纷的画卷。

这一切都毫无异议地成为真实，但远不会曲尽人散、尘埃落定。国人建设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不仅依然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探索的勇气，更需要理性与科学的思考。《2005经济中国》希望为读者展示中国经济生活真实而生动、深刻而复杂的一面，见证时代的发展，更希冀在浓缩的经济大观中折射出思想的穿透力和理性的震撼力，成为一场智慧的盛宴。

《2005经济中国》分为“‘十一五’规划”“经济发展”“金融财政”“国际经济”“民营经济”“农业发展”“产业经济”“工商管理”等六大板块，分别根据若干重要事件或话题选编一些文献进行有机组合，以事件主题入，从深层、多方思考出。无论是宏观大论，还是微观小评，都力求睿智与理性的丰蕴，达到思想性与可读性、

权威与新锐的统一。

面对内容浩瀚，巨细混杂的文献，选编困难在于比较、鉴别以及取舍。在选编过程中我们以思想力作为基本的价值判断，力克情感的偏见，客观平和地审视和对待各类文献，海纳百川，各取所长。但以一己之眼光与见识，要把握好其中标准与尺度常有力不从心的感觉，也就难免有所偏失。

《2005 经济中国》由我确定全书的主题和结构，具体的选编工作由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的何兴强博士、博士生史卫和黄文锋组成选编小组负责。我们邀请众多专家学者推荐和讨论完成有关文献初选。在此基础上由选编人员对初选的文献是否进入相关主题组合作出独立判断。我们将得出的结果加以对照，留下意见一致的文献，然后再通过讨论来消除分歧部分，直到最终取得意见一致。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所入选的文献仅仅说明在相关主题下具有代表性或值得注意，并不表明选编者完全赞同其观点和主张。

《2005 经济中国》是广东省出版集团“年度中国读本系列”之一。为了该书的出版，广东经济出版社姚丹林副社长多次与我商讨选编与出版事宜，作出了不少的努力。

最后殷切期望读者朋友们能够喜欢《2005 经济中国》，这也是我们工作最大的动力和全部的价值所在。

喻世友

2006 年元月于广州康乐园

（作者为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副校长）

目　　录

“十一五”规划

3/ “十一五”规划基本思路和2020年远景目标研究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27/ “一五”到“十一五”经济重点的变迁 ……《中国经济周刊》
30/ “十一五”规划建议透出诸多亮点 …… 新华社
40/ “十一五”的最大“瓶颈”:劳资和谐 …… 巫继学

经济发展

45/ 解析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三大悖论 …… 刘　伟
51/ 走向一种新的发展范式 …… 斯蒂格利茨
66/ 工业反哺农业、城乡协调发展战略:历史与现实的视角 …… 邓宏图　周立群
76/ GDP数字背后的隐忧与挑战 …… 夏业良
80/ 多角度解读经济普查与GDP增加 …… 邓聿文

金融财政

85/ 中国金融行业最新发展报告 …… 中经网数据有限公司
101/ 金融改革风生水起…… 易宪容
105/ 卖出一个好的“银行上市故事” …… 巴曙松
108/ 股权分置改革如火如荼 …… 刘纪鹏
113/ 个税改革:从经济建设型财政到社会保障型财政 …… 张曙光
115/ 为什么个人所得税未能控制贫富差距…… 茅于轼

国际经济

119/ 汇率博弈谁怕谁 …… 徐滇庆
126/ 中国汇率改革与经济发展 …… 马叶玲
130/ 人民币汇率新思维:2%背后的中国智慧 …… 黄 嵘
133/ 中国经济进入全球碰撞轨道 …… 赵 晓 柳 阳
141/ 中国纺织品面临"南北合围"…… 刘建生
146/ 纺织品贸易摩擦背后的"金融陷阱"…… 王东升

民营经济

151/ 民营经济:崛起在中国的市场力量 …… 崔克亮
159/ 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 刘迎秋
168/ 非公经济 36 条:一种新力量的成长与壮大……《西部大开发》

农业发展

187/ 产业资本如何介入乡村建设…… 温铁军
191/ 三农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王海坤
194/ 政府要给农民真正的土地所有权 …… 赵 晓

产业经济

199/ 中国煤、电关系的架构取向 …… 丁 立 刘劲松
210/ "广东油荒"与价格机制 …… 周其仁
212/ 该结束了,石油垄断! …… 盛 洪
216/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为什么这么火…… 赵 晓
220/ 房地产业何时结束"诸侯割据"时代 …… 刘春泉

工商管理

225/ 全球化工厂体制与"道德理念重构"…… 潘 毅
241/ 为什么跨国公司在中国不那么尊重人 …… 马国川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243/ 2005年中国成长企业100强排行榜十大看点 ……
249/ 中国企业开始进入争取“规则制定权”时代…… 杨 鹏
253/ “正规军”为啥败给“游击队”…… 于清教
256/ 面临技术天花板 海外并购没有浪漫曲 ……
262/ 2005年:中国海外并购年 …… 王 巍

“十一五”规划

“十一五”规划基本思路和2020年远景目标研究[*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党的十六大制定了新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要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进一步明确了第三步战略部署的阶段性目标和实施步骤。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不仅强调不同方面的发展要统筹兼顾，而且强调各个领域的改革也要协调推进。这些新的奋斗目标和发展理念上升为执政党的重大战略决策，标志着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飞跃和升华，不仅指引着“十五”期间的改革与发展顺利推进，而且将继续引领未来5～15年乃至整个现代化进程的伟大实践。

一、未来5～15年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分析未来中长期发展面临的各种突出矛盾，仍然要坚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基本国情为依据。概括起来，未来15年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以下突出矛盾：

（一）可持续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加剧

这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面临的最为突出的矛盾。一方面，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并处于新一轮上升周期，经济总量显著扩大，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这些都带来发展空间扩大的新机遇，也势必加大对资源的需求和消耗强度；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面临的资源和环境压力日趋严峻，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长

---

[*] 本文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重点课题《“十一五”规划基本思路和2020年远景目标研究》的总报告。课题负责人：王梦奎、谢伏瞻、辛剑阁；课题协调人：李善同、卢中原、侯永志；总报告执笔人：卢中原。总报告吸收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集体讨论的意见。

方式已经越来越难以为继。

在粗放的增长方式下，未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必将加剧自然资源的供求矛盾，导致经济运行成本上升。我国人均资源紧缺，绝大多数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资源消耗量或自然资产损失量却排在世界前列。重化工业和城市化加速发展，对矿产、土地和水资源的需求将进一步扩大，供求缺口日益凸显。矿产资源的国内保证程度将进一步下降，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日益提高（见表1）。工业用水和城市生活用水将进一步挤占农业用水，水质恶化又制约水资源可供量的增加。非农用地挤占农业用地的势头十分强劲，土地资源将持续紧张。我国的环境承载能力原本就十分脆弱，粗放型经济高速增长所付出的环境代价又过于高昂。目前我国的环境质量仍然处于“局部有改善、整体在恶化”的状态，如果不能进一步转变粗放型增长方式，整体环境质量还可能进一步恶化。

表1　我国主要矿产品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将不断提高

矿产名称	进口依存度（%）		
	2000年	2010年预计	2020年预计
石油	31	41	58
铁	33	34	52
锰	16	31	38
铜	48	72	82
铅	0	45	52
锌	0	53	69

资源和环境对可持续发展的压力，本质上是经济增长方式粗放、技术含量低和经济效率差的问题。我国科技发展不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需要，技术水平低制约着经济效率的提高和增长潜力的发挥。我国除了科技投入总量不足、投入结构不合理以及自主创新能力差等问题以外，由于缺乏降低资源消耗、提高资源利用率和保护环境的产业技术，或是有了这些技术而又缺乏推广应用的机制和动力，科技成果难以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进而使我们难以走出粗放型增长的怪圈。

（二）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的体制性根源日益凸显

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偏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改革不协调，政府对经济的行政干预仍然过多，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的体制根源还没有彻底消除。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投资体制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是政府投资范围界定不清，对竞争性领域的市场化投资介入过宽，行政干预过多。习惯于借助预算内投资来调控经济

需要上中国知网全文 www.cnki.com.cn

运行，而不善于通过政府消费来提供公共服务。二是对全社会投资存在重审批、轻服务的倾向。投资审批政出多门，对民间投资缺乏有关行业供求信息和产业发展导向的服务。行业主管部门撤销后，相关行业信息服务尤其欠缺。三是缺乏科学的、有预见性的宏观产业导向。这一轮经济上升期遇到的能源紧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前期规划缺乏预见、投资不足而造成的。四是在市场准入方面偏重经济性指标，忽视社会性指标。按投资规模层层划分投资审批权，过分相信对投资项目微观经济效益的行政性审批，而对涉及公共利益的社会性指标（主要是环保、安全、质量、能耗、技术和卫生等标准）却长期疏漏。这就既不利于通过市场提高投资的经济效益，又不利于弥补市场缺陷造成的社会代价。

2. 财政税收体制不规范是不利于消除政府过多干预经济的内在动因。一是公共财政体系不健全，政府用于弥补公共服务领域“职能缺位”的开支仍然不足，而一般经济建设领域开支“越位”过多，经济建设费在财政主要开支中比重仍然最高。二是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划分不够清晰合理，各级政府缺乏与本级公共服务职能及其公共开支相适应的正常财税收入来源，导致地方政府纷纷开辟旁门左道以增加财政收入。三是各级政府预算外收入和体制外融资的渠道和支出去向不规范、不透明，其中相当多资金直接投入公共服务以外的赢利性投资项目，对投资膨胀和低水平扩张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四是现行分税制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中央和地方税种结构及其分成比例不够合理，地方财政收入缺乏适合地方经济发展需要的主体税种（例如不动产税等），过于依赖增值税、营业税等流转税，加之与建设项目挂钩的专项转移支付还占较大比重，这就必然促使地方政府热衷于争建设项目、积极干预地方工商业投资。

3. 金融体制改革滞后，金融参数失真。第一，银行体系不能满足经济增长对市场化融资的需要。国有商业银行的组织结构和经营机制不合理，贷款行为扭曲；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狭窄，贷款仍然困难。第二，利率决定机制的行政化程度较高，资金价格对市场供求变化的反应迟缓。利率不能真实反映资金成本和投资风险，加剧了低水平扩张。第三，汇率机制僵化，阻碍了市场供求变动对外汇和人民币比价关系的合理调整。在美元贬值情况下，与美元单独挂钩的人民币相应贬值，容易刺激粗放型出口增长，不利于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既影响到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又缩小了货币政策的选择空间。第四，证券市场的制度缺陷日益明显，股权分置和上市公司质量差的问题迟迟未能解决。证券市场难以健康发展，也难以发挥扩大直接融资、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

4. 环境和资源的使用成本过低，难以形成相应的替代、节约资源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环保和资源利用方面缺少必要的准入标准和补偿标准，建设项目几乎不计环境、资源的使用成本。我国矿产资源税目前还是按照实物量征收，在煤炭等资源价

格大幅上涨时，对资源开采的补偿明显偏低；而且煤、电价格脱节，资源型产品价格的上涨没有相应传导到最终产品。在土地、资金、资源、环境等方面的使用成本都很低的状况下，容易导致不计成本、忽视效益的低水平扩张，不利于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妨害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5. 土地资源配置缺乏规范、长效的管理制度，引发盲目投资和新的社会矛盾。一是缺乏科学、权威的国土资源总体规划和跨行政区域规划，而分省规划在全国建设中起决定作用，必然导致各自为政、任意调整和低水平重复建设，违背区域经济专业化、市场化合理分工的客观要求。二是土地产权主体和权利界定不清，保护不力，对拆迁市民和征地农民缺乏合理补偿，城市国有土地权益大量流失，农村集体土地权益和农民利益受到严重侵害。三是土地收益分配相当混乱，土地收入没有纳入预算管理，也没有完善的房地产税种，该收的土地收益收不上来，对土地收益的不合理使用也难以监督。四是土地供应方式过于行政化，土地使用性质缺乏明确界定，赢利性用地往往假借公益性名义低价甚至无偿征收、征用，导致地价严重扭曲，各种“黑箱操作”和腐败行为猖獗。凡此种种，成为许多地方盲目推进城市化、工业化的制度诱因，城市超大规模建设、野蛮拆迁、乱建开发区、乱占耕地现象十分严重，农民失地失业等新的社会矛盾空前尖锐。

6. 政治领域的改革滞后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导致增长速度攀比和数量扩张冲动。我国经济波动的“政治周期效应”十分明显，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长的高峰，往往正是地方党委和政府换届的时间。现行干部选拔、考核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都存在明显缺陷，对权力运行的社会监督机制也很薄弱，科学民主决策、依法执政等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不利于引导各级政府和党政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不利于抑制低水平扩张和转变增长方式，因之也不利于国民经济按照客观规律稳定运行。

（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的矛盾日益尖锐

中国社会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剧烈变革时期，正在经历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空前机遇和巨大冲击。突出反映在以下几方面：

1. 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严重失衡。一是公共教育资源向高等教育（甚至少数重点高校）过分倾斜，而义务教育的公共投入严重不足（我国高等、中等、初等三级教育的财政投入比例很不合理，高等教育占教育经费的比重 2003 年上升到 24%，而通常为 20% 左右。日本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央教育经费的 60% 拨给义务教育，美国现在州政府提供 40% 以上的基础教育经费，而我国在基础教育投入方面的政府缺位十分明显。国民基本教育尤其是广大农村、中西部边远地区的义务教育尚未全面普及，农村初中辍学率升高，教育经费严重匮乏，教师工资严重拖欠，农村义务教育面临危机。引自《新民周刊》：《事关公平的教育困境》，2004 年第 45 期）。二是公共卫生资源过分向城市倾斜，而农村缺医少药现象仍很严重。这里既有对薄弱

环节重视不够、财政投入欠账较大的问题，更有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弱化的体制弊端。

2. 现有公共财政和社会协调机制不适应社会流动性增强、社会分层加快的新挑战。伴随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城乡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性日益增强，社会成员的选择自由空前扩大，为社会进步注入旺盛活力，有利于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同时，这也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例如，农民向非农产业和城市大量转移，必然要求打破城乡分割的体制性障碍，也必然要求增加城市公共产品和服务，加大城市财政负担；而现有公共财政体系还没有为这种变化做好准备。又如，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紧密结合在一起，新的社会阶层不断生成，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利益关系日趋复杂，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和扩大社会参与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呼声的强弱分布很不均衡，贫困群体和社会边缘群体的呼声还不能得到充分表达；而社会成员的职业和地位也势必在流动中不断变化，既得利益的减少或丧失将引发不满情绪甚至过激行为，狭窄的沟通渠道和单调的社会协调机制已经不适应这种复杂的社会局面。

3. 人口发展态势仍然严峻，对社会转型期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巨大压力。基数大、增长偏快、素质偏低、“未富先老”，是未来二三十年我国人口发展的基本态势（据国家人口与计生委的预测，未来几十年间，人口发展态势将呈现新老问题错综交织的格局：一是人口总量、劳动年龄人口和老龄人口三大增长高峰叠加，总人口预计在 2033 年达到 14. 7 亿的峰值，未来十几年每年将新增人口 800 万 ~ 1000 万；劳动年龄人口于 2016 年达到 10. 1 亿的高峰，占总人口的七成；“未富先老”凸现，65 岁以上老龄人口比重将由 2000 年的 6. 7% 上升到 2020 年的 11. 4%，进入空前的快速增长阶段，预计到 2050 年达到高峰。二是人口素质存在深层结构性缺陷，出生人口素质、身体健康素质和文化道德素质等都亟待提高。2000 年我国 15 岁以上文盲、半文盲达 8507 万人，人均受教育年限仅相当于美国 100 年前的水平。三是出生性别比例严重失调，预计到 2020 年男性将比女性多 3000 万人。四是艾滋病迅速蔓延，预计到 2010 年将超过 1000 万人）。在现有技术水平和制度框架下，这种严峻的人口发展态势必将加剧对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必将使多重经济社会压力接踵而至，社会领域发展滞后的矛盾势必会更加尖锐。就业压力、养老压力、婚姻压力、城乡融合压力和社会稳定压力等，都将以前所未有的分量落在我们肩上。

4. 城乡贫困群体有所扩大，贫困问题有所反弹。农村贫困问题主要源于生存环境恶劣、受教育程度低等因素，城市贫困问题则主要源于文化、年龄和技能等人力资本约束。随着城市化浪潮和社会转型加速，在失业人口、流动农民工、失地农民和老年人口中正在形成新型贫困群体，城市贫民阶层已经出现（据保守估计，目前失地农民已超过 2000 万人，而且还将以每年 250 万 ~ 300 万人的数量增加。大量

“种地无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游民正在成为新的社会边缘群体，并有可能成为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引自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3月23日）。城乡低收入和贫困群体生活困难，导致贫富差距迅速拉大。我国城乡贫困问题日益凸显，鲜明地折射出社会领域发展滞后的现实，诸如公共财政缺位、社会保障不健全、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以及收入再分配手段不完善等。国际经验显示，贫困蔓延及其所带来的挫折感和绝望情绪，很容易成为社会动乱的导火索，是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最值得密切关注的社会问题甚至政治问题。

在社会剧烈变革时期，如果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得不到合理调整，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非政府组织不发达，社会舆情沟通渠道不畅通，社会领域各种常规性的协调机制不健全，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势必干扰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

（四） 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挑战日益严峻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地理条件差距、人口资源分布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也是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据研究，中国人均GDP和人类发展指标的相对差异系数，要高于世界各国的相对差异系数。

从经济发展差距看，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在加快，但因基础薄弱等因素与东部的差距仍然拉大；从社会发展差距看，不同地区的差距相对小一些。

区域发展极大不平衡是我们必须长期面对的基本国情。在这样一种基本国情下继续发展市场经济，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继续扩大将势所难免。这主要是因为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程度会不断提高，要素流动将越来越取决于投资回报率等经济效益标准和区域经济专业化分工等客观经济规律的导向。

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要害并不在于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而在于有没有整合效果较好的区域政策，能不能通过这种区域政策使欠发达地区得到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改善其发展经济的基本条件，提高当地人民群众的福利水平，缩小不同地区之间的社会发展差距。如果各地区社会领域发展的差距继续扩大而不是缩小，则将表明中央财政对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还不够，区域政策在消弭市场缺陷方面的效果尚不理想，还没有明显改善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还没有显著增强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的能力和后劲，还不能普遍提高欠发达地区的全民福利水平，因而也将不利于改变目前全国低水平、不全面、不平衡的小康状况。因此，中央政府如何通过合理的区域政策，为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提供充分的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增强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日益成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任务。

（五）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确定因素和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加

在全球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合作加强的趋势并存，世界各国和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将长期持续并且可能发生分化重组，从而演化出新的双边、多边国际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合作机会。

我国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发展开放型经济，无疑有利于我们更充分地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扩大我国经济发展的回旋余地，增强国际竞争力。未来 5～15 年国际经济环境总体上有利于我国加快经济发展，同时，一些能够看清的重大风险和挑战将紧紧伴随历史机遇，而不确定、不可测和不稳定因素也将层出不穷。

国际区域合作加强与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并存的格局将继续发展。一方面，我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等，扩大了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空间；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大国，而出口增长主要靠数量扩张和低价竞争驱动，加之处于非市场经济地位，因此国际上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高发期已经来临，并将持续相当长时间。如果对这些贸易摩擦处理不当（例如一味追求贸易顺差等），我国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的余地有可能缩小，外部经济环境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可能加大。

未来我国经济发展将越来越受到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一是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扩大，世界经济波动也将加快向中国传导。虽然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还很小（2003 年中国 GDP 排位第六，仅占世界经济总量的 4%），但是经济增长速度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却很大。如果世界经济增长放慢甚至陷入萧条期，对中国经济增长也会产生明显制约。二是中国经济开放程度日益提高，对国际市场和资源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国际市场上能源、粮食和矿产品价格波动势将对国内市场价格、企业成本和供求关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从而会使国内经济运行出现异常波动。

加入 WTO 过渡期结束后，我国经济将面临更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和更多的“新贸易壁垒”。“十五”期末我国将处于加入 WTO 的后过渡期，我国将要全面兑现在扩大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领域的市场准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法规透明度和贯彻国民待遇原则等方面所作出的承诺。这一方面有利于我国得到更为广泛的资本、先进技术和知识来源，另一方面也将使国内弱势产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国际竞争，同时还会进一步暴露现行经济体制和政府职能存在的缺陷，凸显深化改革的紧迫性。

此外，发达国家今后会越来越多地运用绿色标准、技术标准、劳工标准、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等新的手段，来约束国际投资和贸易活动。虽然目前这些标准还没有成为公认的国际经贸规则，但是仍会给我国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对外贸易带来新的制约。

参与全球化将给我国带来一系列新的经济风险，而我国符合开放型经济要求的

宏观调节手段和风险防范机制还不健全。

一是金融宏观调节的选择空间受到金融领域扩大开放的挤压。在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情况下，资本的流入流出势将加剧，国内货币供应和国际收支平衡将遇到较多不确定因素。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开放，有利于防范短期投机资本攻击人民币，维护资本市场稳定。但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存在缺陷，汇率长期相对固定，将难以调节外汇供求关系，也对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和有效性产生制约。如果汇率不能灵活变动，中央银行将很难兼顾人民币币值对内稳定和对外稳定。国际上通常认为，在开放型经济中，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是不可兼得的。这一规律性的现象在我国也将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

二是跨国公司可能造成某些行业性垄断。这种行业性垄断产生于市场竞争所演化出的市场控制势力，在市场经济国家通常运用反垄断法进行规制。而我国还缺乏相应的法律手段，对跨国公司在某些行业已经占据的过高市场份额和存在的垄断行为，难以进行防范和纠正。

未来 5～15 年，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多变，机遇和挑战并存，相互转化的不确定性增加。这种复杂局面必将对我国完善趋利避害的机制和艺术提出更高要求。

二、未来 5～15 年发展的基本任务和前景展望

对未来国内外发展环境大趋势的看法，仍然应当坚持党的十六大作出的基本判断，即 21 世纪头 20 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根据到 2020 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十一五”期间，应当大力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方面迈出较大步伐，力争到 2010 年使经济发展登上一个新台阶，为后 10 年继续前进奠定更高水平、更加坚实的新起点。

（一）努力实现经济持续较快平稳增长，综合国力将再上一个新台阶

未来 5～15 年，我国经济仍然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可以保持 7%～8% 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预计 2005—2010 年，我国经济增长年均可保持在 8% 左右，GDP 总量将达到 2.4 万亿美元左右（按 2000 年汇率计算，下同），人均 GDP 可能达到 1700 美元，比目前中下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高出 500 美元；2010—2020 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放缓为年均 7% 左右，GDP 总量将达到 4.8 万亿美元左右，人均 GDP 达到 3200 美元左右，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

在未来 5～15 年间达到经济增长的上述目标，既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发展空间，又有比较充分的发展要素供给条件。

1. 居民消费结构由温饱型向小康型升级，创造了新的市场最终需求。向全面小

康社会迈进的中国人民在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后，消费热点由温饱阶段的改善吃、穿、用，迅速向小康阶段的改善住行条件转变，城乡消费者将越来越多地要求满足享乐和发展的需要，要求不断提高生活质量，这是当前乃至今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最深厚、最可靠的动因和支撑力量。

2. 产业升级打破原有的结构平衡和供求关系，拓宽了新的增长空间。在消费升级和相关高成长产业的推动下，对技术进步的需求逐渐趋强，进而导致产业结构升级幅度再次出现增大趋势，特别是在工业内部表现得更为明显。

从产业联系的角度看，住房、汽车是终端产业，重化工业是中间产业，能源、运输是基础产业，相互间环环相扣。房地产和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必然对钢铁、水泥、有色、石化、机械装备等重化工业产生巨大需求，打破终端产业和中间产业原有的供求平衡。重化工业的加快发展也必然对煤电油运产生巨大需求，并打破中间产业和基础产业之间原有的供求平衡。重化工业、能源运输产业都是资金密集型产业，其加快发展必然导致投资高速增长。新一轮产业结构失衡导致新的市场供求缺口，并引起价格上涨，形成利润丰厚的发展空间，刺激相关产业迅猛增长。

从产业结构变动所产生的推动效应看，与最终需求密切相关的产业结构提升是经济增长的中长期推动力量。根据对中国经济波动周期的实证分析，产业结构升级加快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大约能持续 8～10 年，中国经济在中长期内将保持上升趋势。

3. 城市化进程加快，将促进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扩大。未来城市化进程的势头仍然强劲。大批农民向城市转移，一方面促进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并对城市基础设施产生巨大需求，带动投资需求迅速扩张；另一方面农民的消费行为逐步市民化，促进城市消费需求的增长。城市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会逐渐向农村扩散，从而带动全社会总需求的增加。

4. 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将进一步激发经济活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随着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逐步深入，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不断完善，以及市场竞争环境进一步健全化、公平化，各种创造财富的活力将竞相迸发，民间投资会进一步活跃，整个经济的自主增长能力会进一步增强，市场将在更大程度上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使未来经济增长进一步实现速度和效益的统一。

5. 生产要素的组合状况比较有利，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内源性和较大的回旋余地。我国生产要素组合方面的比较优势，突出表现为市场容量巨大和劳动力充裕，这两个要素属于难以替代的、内生的“不流动要素”，是我国得天独厚的。长期比较短缺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知识等“流动性要素”，则可以通过市场化改革加以挖掘，也可通过扩大开放而得到弥补。事实上，这些流动性要素的供给也在不断增加，

生产要素组合状况日趋改善。这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依托，使我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首先，我国市场容量将随着居民收入增加和消费升级而不断拓展。

十几亿人口本身就构成独一无二的潜在市场容量，随着人民收入水平提高，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不断增强，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由温饱型提升到小康型，改善生活质量的消费需求日益多样化和消费领域不断拓宽，潜在的市场容量将转变为不断扩张的现实市场容量。城乡经济建设正在大规模展开，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迅猛，况且投资需求有四成将会转化为最终消费需求，因此，投资品市场和消费品市场的购买需求都将非常旺盛。

其次，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人工素质提高而成本仍保持低廉。

我国人口基数大，适龄劳动力增长快，城市化进程和非农产业发展正在加速，欠发达地区的大量农民工不断涌入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已经并将继续遏制人工成本的上升。在人工成本保持低廉的情况下，劳动力素质随着教育普及而逐步提高，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尽管存在结构性供给短缺，但人力资本状况总体上也在逐步改善。

再次，资金供给相对充裕，金融抑制状况可得到逐步解除。

我国居民素有高储蓄的传统，总储蓄中有五成以上来自居民储蓄。其余为政府和企业储蓄。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总储蓄率（总储蓄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稳定保持在 40% 以上，2003 年达到 47%，远远高于 20% 的世界平均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低储蓄传统形成鲜明对照（例如美国的总储蓄率为 15%，居民储蓄率仅为 5%）。高储蓄是高投资的基础，因此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的投资率平均为 40% 左右，也远远高于 20% 的世界平均水平。

我国金融改革的深化将进一步解除金融抑制，调动更多的金融资源，高储蓄率将继续保持，再加上外汇储备相当雄厚（2004 年达到 6000 多亿美元），我国经济增长可望得到有力的资金支持，能够避免一般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所面临的资金短缺困扰。

（二）投资与消费关系应当逐步得到合理调整，人民群众将从经济增长中得到更多实惠

投资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否合理，既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健康发展，工业化进程能否顺利推进，也关系到城乡居民能否从经济发展中得到更多的实惠。影响我国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主要因素有：

1. 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是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根本出发点。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的潜力还很大，需要进一步拓展居民消费的空间。但是随着收入差距扩大，城乡低收入群体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可能制约消费率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